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二十五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 7-218-01720-7/K·361

定价: 7.80 元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二十五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 01 号

责任技编：卢 荻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二十五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空军政治部印刷厂印刷

厂址：广州市环市东路 475 号大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15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册

IBNS7—218—01720—7/K. 361

定价：7.80 元

目 录

回 忆 录

- 难忘的岁月(中)..... 刘田夫(1)
- 南路部队东进粤中的峥嵘岁月 吴有恒(68)
- 风雨同舟在香江 罗培元(76)
- 我在粤桂南地区工作的回忆 黄明德(89)
- 闽粤赣边纵队电台工作的回顾..... 刘 旭(105)

党 史 专 题

-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简史(中)..... 陈登贵(114)
- “九·一八”事变后的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 刘 寒(138)
- 叶挺将军在黑茶山遇难之经过..... 邹金城(155)
- 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的
- 紫金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 张 杰(162)
- 龙川早期工农运动..... 黄 义(170)
- 民主革命时期粤北瑶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黄兆星(184)

解放万山群岛..... 高宏的(199)

——记我军第一次步炮海军协同作战

韶关地区抗美援朝运动综述..... 朱定桂 黎集慧(209)

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与东莞经济的发展..... 蔡玉雄 李孜(221)

人 物 传 记

杰出的金融贸易家庄世平..... 康模生(232)

大 事 记

从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时期的

广东革命文化运动纪程..... 袁小伦(240)

难忘的岁月(中)

刘田夫

第五章 地下斗争

一、隐蔽西江

1939年5月,广东省委决定我从张发奎第四战区司令部撤出来,转到地方工作。6月我离开张部,在省委机关住了两个多月。其时,省委估计日军可能会很快打通粤汉线,占领粤北,为有利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省委请求中央,将赣南特委划归广东省委领导。8月,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找我谈话时说:“本来想派你到赣南特委去工作,后来考虑到杨尚奎同志是本地人,对那里情况比较熟悉,工作起来方便,所以派他到赣南去了,现在就派你到西江去当特委书记。”

我的前任是王均予同志,调回省委任秘书长。王均予是湖北宜昌市人,原在上海临时中央局文委系统做发行工作。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后,他于1935年7月来到广州,在广州进步学生中建立起了秘密革命组织“中国青年同盟”。翌年任中共广州市临时工委书记。随后,调任西江特委书记。在我未去西江之前,他已到韶关接任,因

此在韶关向我交代了工作。

9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从韶关搭船顺北江南下。面对浩荡江风,潺潺流水,我的心情是既兴奋又有点忐忑不安。因为我要到的西江地区,无论语言及风土人情都与巴蜀迥然不同。第二天拂晓,船到达清远。我上岸后,即从这里步行到四会,再转广宁。当时西江特委设在广宁农村,我步行到了石洞圩,欧新和黎百松同志接待了我。随后,我在这里见到了特委组织部长梁嘉同志,青年、民运部长朱荣同志,宣传部长梁威林同志在肇庆,一时还未见到他。

广宁县是个革命老区,大革命时期,在党和农民领袖周其鉴同志的领导下,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大革命失败后,西江党组织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摧残,基本停止了活动,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才恢复了党的组织。西江特委管辖高要、四会、广宁、德庆、封开、郁南、罗定、云浮、新兴、三水、高明等县。特委成员除我和梁嘉、梁威林及朱荣外,还有梁威林的爱人徐英同志,她管妇女工作。是年12月,朱荣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离职到延安去了。朱荣是广东增城人,曾任广东青年抗日救亡先锋队总队部党总支书记。抗战中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北方工作。建国后,历任广东省民政厅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农业厅厅长,省农科院院长,广州市委书记,农业部、农林部、农牧渔业部副部长,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朱荣走了之后,到了1940年初,又增加了杨甫同志。他原来是马来亚共产党员,抗战初期回国,广州沦陷时被派到西江工作,原来在罗定当县委书记,后来把他调回来参加特委。另外,原新兴县委书记龙世雄同志也调回特委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先后在特委机关工作过的还有陈彦祥、谭丕桓和唐章等同志。唐章后来在广宁任县委书记。谭丕桓原是四会县临工委书记,后来调回特委机关。他为人老实,工作认真细致,机关的具体工作主要靠他干。

10月，我到韶关，参加省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文彬、李大林、涂振农、古大存、区梦觉、尹林平、梁广、饶彰风、王均予、刘田夫、罗范群、石辟澜、李殷丹、黄松坚等人。主要议程是正式传达学习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选举出席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前一段是在南华寺附近的省委党员训练班举行。后一段迁到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部的卫生部长陈汝棠的机关，以陈部所属护干班秋训的名义举行，前后开了半个月，安全地完成会议的任务。

这次会议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根据党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在国统区我党长期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研究打破反共高潮的应变措施。会议决定以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要求各地党组织在4个月内完成对干部的审查、教育工作，健全组织生活，巩固基层组织。同时要加强琼崖、东江等地区的武装斗争等。会议总是开得好的。据我现在的回忆，不足之处是没有深入地分析研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下广东的政治形势，并根据这一形势，明确转变我党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保存力量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共产党的一个省级会议，居然能在国民党的一个机关中安全地举行，这全靠陈汝棠先生的帮助和支持。陈汝棠先生当时是余汉谋部的卫生部长，抗战初期，他主持举办多期救护干部训练班，并建立了全省的救济总队，分队几乎遍布全省，实际是在我党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的工作。此次会议就是利用护干班秋训的名义举行的。这说明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也说明陈汝棠先生是党的真诚朋友，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这次会议的闭幕式还邀请陈汝棠先生参加。他在会上大概讲

了20分钟的话。他风趣地说“我是个红色医生，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以后实践证明，是当之无愧的。陈汝棠先生是高明县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以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医官。香港沦陷后，转到东江纵队，从事医务工作。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卫生厅长，副省长，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民革中央委员，长期与我们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诚合作，很值得我们怀念。省委执委会扩大会议结束，我又回到了西江。考虑到广宁地处偏僻，交通闭塞，不利于领导整个西江地区的工作，所以特委商量后，决定把特委机关从广宁搬到肇庆市。

肇庆乃西江中游的重镇，是广州通往广西的咽喉之地。它依山带水，以七星岩秀丽迷人的湖光山色和端砚而驰名中外。滨江的阅江楼是当年我们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的宿营之地。

我住的房子是国民党肇庆市武装中队长陈志驹（党员）帮找的。梁威林住的是一个姓陈的国民党电台台长的房子，刚进他家住的时候，他还不是党员，以后也入了党。梁嘉住在肇庆市尾的一家单家独屋里。梁嘉是广东开平人，1936年冬入党，曾任广州市委青年部长，省委青委委员，广东“抗先”第一总队副总队长。抗战时期，我和他在西江和粤中地区曾共事多年。

我们特委机关原在广宁农村，那里党员比较多，群众基础也好，他们安排我们住在一个易于隐蔽的农村里，这本来很适宜从事地下工作。但我们在反共高潮的情况下，却没有从政治形势上考虑问题，将特委机关迁入城市，这是不利于隐蔽的。因为，西江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及要人都聚集肇庆，鹰犬特务很多，我们人生地不熟，稍一不慎，便易暴露。虽然4月以后，特委机关迁到了德庆县城，但

县城太小，仍然是容易暴露的。机关虽未遭到损失，但将机关由农村迁入城市，现在回想起来，是不适应当时形势的，不是明智之举。

我迁入肇庆市后，为更好地掩护机关工作，组织上派周敏玲同志来住机关，做假夫妻。她是新会人，20岁，是个入党一年多的新党员。我到肇庆后，首先碰到的是语言不通的问题，我讲一口四川话，地方干部尚可听懂，下面的党员和群众就根本听不懂。这不仅不利于工作，而且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一个外江人很容易被敌人发觉，于是我冒充是紧靠湖南的广东乐昌人。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和更好地掩护自己，我下苦功去学广州话，不懂就问，经常请教周围的同志，每天晚上，还跟周敏玲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慢慢就学会了广州话，掌握了这一语言工具之后，我联系干部和群众方便多了，同时，在社会上，亦能从容应付，因而更好地掩护了自己。

周敏玲住机关，其主要任务是掩护机关安全，照顾好来往人员，保管好党的文件。我们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周围龙潭虎穴，环境异常险恶，随时都可能会遭到不测。这不仅要求我们要做好被捕坐牢的思想准备，而且还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我们在这里刚住不久，一天夜里，国民党的警察突然来查户口。他们发现我们既然是夫妻，却分开楼上楼下住，认为其中大有文章。周敏玲马上作解释，说我患病，怕传染，故分开来住。她费尽口舌，总算应付过去了。但因我们家陈设过于简单，他们仍疑窦难消。我见情况不妙，翌日清晨便离开机关。果然不出所料，警察所又来人，传周敏玲去查问。由于我们事先已准备好了一套口供：什么地方人，何时何地结婚等等。警察见她态度从容，应答如流，只好作罢。我与周敏玲患难与共，朝夕相处，逐渐加深了理解，产生了感情。1940年3月，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到南路，路过肇庆，检查了我们的工作，经向他请示

并得到批准，我们两人结婚了，从此便由假夫妻变成了真夫妻。

我到西江特委工作，正是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抗战初期那种公开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已经过去了。抗日青年组织（抗先、青抗等）被顽固派解散，我们党领导办的进步书店、进步刊物受到查封和取缔。国民党正在进一步伺机破坏我们的党组织。针对逆流，省委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反动派解散抗先等抗日救亡组织时，主动把我们的干部先撤出来，同时在政治上发表声明，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政策，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我们西江特委执行了省委的决定，如国民党反动派宣布解散西江青年抗日先锋队，我们由李超同志写文章加以抨击，同时撤退干部，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梁威林等同志在《三罗日报》和特委机关刊物《大众》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国民党提出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三坚持三反对的政治主张。我也曾以铁夫的笔名，在《大众》杂志上撰写了《与严重的时局搏斗》一文，指出当前时局最危险的方面，就是分裂倒退，投降妥协，揭露反动派投降卖国的事实和阴谋，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和国民党抗日将士，在这严重的时刻，进行顽强的斗争。副刊还发表了《注意投降派的新妆》等10多篇宣传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的文章。

当时罗定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基础并不算好，仅罗定中学、泗伦中学、印刷厂和书店以及××教育社等，有人数不多的党员，而且多是外面派进来的老师和本地一些学生，在农村没有多大基础。统战关系有一点，主要靠罗定县委管统战的委员谭朗超同志同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师长谭启秀的关系。谭启秀有一点实力，是抗日的，不反共。但在反共高潮的形势下，他也顶不住。结果，在4月26日，即《大众》杂志出版的第二天，国民党县党部就借用图书审

查委员会的名义，封闭了《三罗日报》和“汇合书店”，并且查抄了印刷厂，逮捕了《三罗日报》的编辑谭朗超和张一鸣、陈公朗、吕友等同志。为防事态扩大，我们从罗定撤走之前，布置三罗（罗定、郁南、云浮）中心县委把已暴露的干部统统撤走，稳定局面，并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被捕的几位同志对党忠诚，在敌人淫威面前坚贞不屈，后经营救出狱，事态因此没有扩大。谭朗超是中山大学学生，入党很早。他是县委委员，什么情况都了解，但他对党矢志不渝，严守机密，没有暴露一点情况。解放后，我们抄了敌人的档案，国民党县公安局认为谭朗超是最“反动”的，这从反面证明他是一位很好的同志。

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当时把特委机关由农村迁入城市和继续在罗定开进步书店，办印刷厂，出版特委机关刊物，说明我们对反共局势的认识是不足的，不会适应形势的变化，转变工作的方式（由半公开转入秘密），对抗战初期半公开的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还有盲目的留恋，因此群众工作不深入，不扎实，党的组织力量不能很好地隐蔽。

以后，为了保护干部，特委注意把比较暴露的干部调到外地去，各县干部交流，把党员和抗先中比较进步的同志转到农村去，一面教学，一面开展秘密革命活动，靠微薄工资维持生计。这样，西江的党组织基本上保存了下来，没有受到大的破坏。

二、轮训党员，整顿组织

我在西江特委工作了一年，开始几个月，多数时间到各县了解情况。就我记忆，这期间特委在组织上主要抓了两项工作。

首先是轮训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党性和革命气节的教育。1940年二三月间，特委在罗定举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有20

多人,除了罗定县的部分骨干外,还有来自西江各县的党员干部,我记得有谭德等同志。我为学员讲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梁威林讲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杨甫讲党的建设,龙世雄讲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后,特委还继续在罗定等地办了数次党员训练班。由于白色恐怖,在罗定办不下去就搬到郁南办,在那里办不成就搬到德庆办,再办不成就分散办。我自己也在三水县芦苞办了一期小型训练班。6月间,我从肇庆过江到白土,再转向东走。时值洪水爆发,我趟着水走过一片低洼地,走到蒋岸,然后过江到达芦苞。其时,三水县南部已沦于敌手,国民党县政府迁到芦苞镇,这是广州通往长江流域的走私孔道。那时芦苞商业畸形发展,商旅较多,市场较为繁荣,栉次鳞比的商店里充斥着各种洋货及日杂用品,几百家旅店应接不暇,有些旅客只好住在沿江停泊的一二百艘小艇上。一到晚上,灯火辉煌,如同白昼,人们攘来熙往,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我住在一艘小艇上,原因是国民党警察晚上检查水客很马虎,住在船上比较安全。我利用广东人有游河的习惯,在船上举办训练班,参加轮训的有10人左右,女党员居多,记得有李静音、邓茵和叶涤如等同志。我们叫船家把船划到十里八里的郊外游河,我在船上给大家讲党课,这样训练了半个月左右。船家是一个50多岁的妇女,她没有文化,不问政治,因此,我们得以安全地完成了训练任务。从事后的效果来看,训练党员的工作是必要的,是好的。

其次是整顿党的组织。主要是在广宁和高明两县进行。广宁整顿组织工作,由广宁县委书记唐章同志负责。广宁当时有党员400多名,是西江地区党员最多的一个县,多数是农民党员。大革命时期,广宁是广东农民运动发展得很好,规模很大的一个县。在广东农民运动著名领袖周其鉴的领导下,广宁农民运动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党团组织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党员人数很多。抗战爆

发后，黎百松、孔令淦率领港澳回乡服务团回到广宁，找到了一些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同志，恢复党的组织。但恢复党籍不够严格，因此，党员数量虽多，部分党员质量不高，不够党员条件。所以决定加以整顿，主要是加强教育，如少数经过教育，仍不够条件，不愿做党员的，就除名或退出一部分。高明县的党员虽少一点，但质量比较好。这里大革命时期也很有基础，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等都是高明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广州沦陷后，党派李守纯同志到那里当县委书记。我到高明检查组织整顿工作时，县委书记是黄文康同志。广宁、高明县整顿基层党组织以后，党员队伍相对纯洁了一些，战斗力也增强了。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效果也较好。

这里，还须提及的是，在我到达西江之前，西江特委在四会、三水、新兴等县开展了一场“肃托”斗争，解散了国民党广东省税警总团政训处中共（地下）特别支部和国民党三水县政府中共（地下）特别支部，撤销了中共四会临工委，宣布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李之华（邬广汉）和三水县长、抗日爱国民主人士田竺僧为托派头子，内定政训处中共特支书记包华（鲍华、鲍哲魂）、三水县政府中共特支书记陈少陵为托匪，把一些同志打成“托派”，把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打成“托派外围组织”，用不接头、中断组织关系的方式清洗党员，致使一部分党员失去党籍。解放后，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干扰，这一历史错案，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继续扩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我在韶关，前任西江特委书记王均予向我交代工作时，谈到了“肃托”一事，他讲得十分肯定，认定就是“托派”，我对此没有怀疑。到西江后，特委的同志也没有提及此事，因此没有复查这一事件。我也是有责任的。结果，拖了几十年，成了一个大冤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会、三水两县县委和两县党史办公室，本着实

事求是的精神,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复查,平反了这一冤案,重新作了处理。中共肇庆地委根据省委组织部文件通知的精神,于1984年3月对两县县委的调查报告作了批复,指出:“原中共西江特委于一九三九年在四会、三水县开展的肃托斗争事件,是没有事实作依据的,是个错误事件,应予纠正,彻底平反。”后来,对新兴的“肃托”事件亦作了纠正。这样,一宗历时40余年的历史冤案终于得到了澄清,受这一事件株连的组织和全体人员得到了彻底的平反。肇庆地委和四会、三水、新兴三县的同志,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三、中 区 风 云

1940年6月,省委在南雄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并确定我省党组织的工作重点放在敌后和前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会上,根据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将广东省委划分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粤北省委设在韶关,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设在香港,书记梁广。会议还决定抽调干部加强对我领导的抗日部队和地下党的领导工作。

8月间,原省委书记张文彬约我到桂林去,住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并在此同我谈工作。我向他汇报了西江的情况。他主要是谈我的工作调动问题。他说:“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同志,省委决定调他到珠江三角洲,加强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同时决定调你去接任中区特委书记的工作,并调原中区特委副书记冯桑同志任西江特委书记,接任你的工作。”为了党的工作需要,我表示执行省委的决定。

9月,我与周敏玲一起,从肇庆过江,经高明县更楼到开平月

山圩，和梁嘉同志接上头，并在他家里住了两天。本来，他在5月间，省委已决定调他到南路特委工作。当时，他还家里未去上任。两天后，梁嘉带我们到中区特委机关所在地开平赤坎镇，见到了罗范群同志，接收了中区特委的工作。中区特委辖开平、恩平、台山、新会、鹤山、高明、阳江、阳春等县。特委成员除我外，有陈春霖（陈旺，组织部长）、杜俊君（邓健今，宣传部长）、黄泽成（青年部长）等同志。张靖宇也是特委委员，任两阳（阳江、阳春）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省委调李国林同志任中区特委组织部长，调陈春霖任高明、新兴中心县委书记。是年初，宣传部长杜俊君请假回家乡梅县不回来了，后来才得知他到了亲戚——张发奎部队的一位副官处长那里工作去了。特委只好由青年部长黄泽成兼任宣传部长。

此期间，张靖宇在两阳工作时，党员、干部对他意见很多，而他又报告说阳江党内混进了托派分子，组织不纯，党内闹分裂，另立县委。当时，省委根据张靖宇的汇报，怀疑两阳的党组织可能已被敌特篡夺领导权，拟予以解散。为了查清问题，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的处理，特委决定派恩平县委书记周天行同志以特派员的身份去两阳负责检查和整顿党的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他向特委写了报告，认为阳江党组织基本上是好的，党员和干部对党是忠诚的，较差的只是个别人。党内不团结、闹纠纷，责任在张靖宇，听不进党员、干部的意见，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他还吃吃喝喝，不工作，下面的干部看不惯，因此意见很多，不服从他的领导，甚至另组县委。特委经过研究，认为阳江某些党员有错误，但还是认识问题，大多数党员还是好的。决定撤销张靖宇两阳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调回特委另行分配工作，并决定由周天行接替两阳中心县委书记。我们特委实事求是，深入细致地处理了两阳问题，保护了一大批党员，巩固了当地的党组织，它为日后粤中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打下了